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第二十九卷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 學 研 究

第二十九卷

主 編

袁 行 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天有	王小甫	王邦維	吳同瑞
袁行霈	陳 來	高崇文	張學智
程郁綬	董洪利	趙匡華	趙爲民
閻步克	鄧小南	蔣紹愚	樓宇烈
錢志熙	嚴文明		

特約編委

許 逸 民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一二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 第二十九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301-20665-2

I. ①國… II. ①袁… III. ①國學-中國-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2298 號

封面刊名:集蔡元培先生手迹

書 名: 國學研究(第二十九卷)

著作責任者: 袁行霈 主編

責任編輯: 徐丹麗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0665-2/G · 342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22.5 印張 345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60.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ku.edu.cn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成立二十週年紀念

本刊之出版，先後承蒙
南懷瑾、查良鏞、駱英等先生
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員會慷慨資助，
特此致謝。

目 錄

熾俟與 Chigil 考	王小甫 (1)
漢語常用詞考源	蔣紹愚 (19)
士庶分隔與兩晉南朝文學的關係	錢志熙 (41)
王夫之的《大有》詮釋與現實關切	張學智 (85)
枝條五經與彌綸群言	
——《文心雕龍》“子書說”芻議	張 翔 (107)
先唐文集與文體	楊 賽 (125)
論宋代《詩經》學對三家《詩》的重新發現	馬 昕 (147)
江瀚的三家《詩》學及其他	李 霖 (183)
秦漢縣鄉聚落形態考論	孫聞博 (215)
災害應對與唐文宗朝政	張 龍 (233)
唐代鄭氏《女孝經》探析	
——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唐代女孝觀	李志生 (257)
劉幼雲舊藏敦煌本《劉子》輯校	劉 明 (295)
《書史會要》版本研究	趙陽陽 (319)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大事記 (2011. 07—2011. 12)	(343)
徵稿啓事	(347)
來稿書寫格式	(348)

熾俟與 Chigil 考

王小甫

【提要】 Chigil 是我國西北古代的一個族群，其與漢文史料的勘同比定一直未能解決，影響到中古西北史地相關問題的研究。本文利用異文材料並借助漢語音韻學發展的成果，論證中古時期的 Chigil 一名祇能與熾俟而不能與處月勘同，從語音比定方面解決了這一學術難題，為相關研究的深入創造了條件。

Chigil 是我國西北古代的一個族群名稱，最早見於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磨延啜碑）^①。10 世紀上半葉的阿拉伯遊歷家阿布·杜列夫在其割記^②中歷數所經諸部，提到有 Cakil^③和 Baghrac（薄落/謀落）。這個名稱在 10 世紀下半葉成書的佚名作者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和 11 世紀上半成書的加爾迪齊《記述的裝飾》（波斯文）中都寫作 جکل^④，所以俄國突厥學家巴托爾德曾將其轉寫為 Jikil/Chigil，英籍學者米諾爾斯基採用了後一種轉寫^⑤；《伊斯蘭百科全書》（新版）轉寫為 Ćigil^⑥，日本學者內田吟風同此^⑦，Ć = Ch，這只是轉寫符號的不同。另外，由於缺乏元音符號，蘇聯有學者對 جکل 讀作 Чигил = Chigil 表示懷疑，提出過 Чагал = Chagal 的讀法^⑧。其實，根據磨延啜碑的突厥文拼寫法，讀作 Chigil 是沒有問題的。

Chigil 的勘同問題，學界歷來有不同意見。最早是德國學界巨子繆勒（F. W. K. Müller）將其與葛邏祿三部之一的熾俟勘同；法國伯希和初欲贊同繆勒之說，旋又疑 Chigil 為西突厥別部處月^⑨。上世紀 50 年代，法籍美國學者哈密屯

(J. R. Hamilton)又在伯希和假設的基礎上想進一步將 Chigil 與 10 世紀的衆熨部落勘同^①。我國學界對 Chigil 的譯法亦有兩種：王靜如依伯希和之提示，以 Chigil 為處月；岑仲勉則考證為熾俟^②。繆勒讀“俟”為 il 或 ir，雖有類例卻未遑從音韻學加以論證^③，岑仲勉的考證又不為學界普遍信服接受，故近年我國學界對 Chigil 的譯法仍持兩端，或作熾俟^④，或作處月^⑤。熾俟和處月是我國西北古代的兩個族群，Chigil 究竟與哪一個勘同，這不僅是翻譯的技術性問題，而且涉及對這兩個族群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葛邏祿和西突厥歷史的認識，故不可不分辨清楚。好在拼音文字基本保留了原古音，而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也使得我們可以近似地擬測出漢語古音^⑥，再者有關熾俟和處月的漢文史料也不難查找，故本文擬主要從語音史料勘同方面論證 Chigil 當為熾俟而非處月。至於同本項研究有關的處月、cünüda 與衆熨勘同等問題則擬另撰專文討論。

一、“熾俟”異文“職乙”

為了研究而對古音(上古音、中古音)擬測，當然需要有一個標準，目前學界通用的標準就是“《切韻》系統”。王力先生說，“中古漢語語音，以‘《切韻》系統’為標準”，“一般所謂‘《切韻》系統’也就是《廣韻》的系統”^⑦，因為“中國現存的韻書，以《廣韻》為最古。所以我們研究古音，該從《廣韻》向上推求；研究今音，該從《廣韻》向下推求”^⑧。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倡有音韻學研究四法，其“三曰旁征，民間俗語，每存古音，異族方言，可證舊讀”^⑨。李新魁亦主張：“我們在拿這一韻書系統(指《廣韻》系統——引者)所代表的語音來做研討中古音的依據時，不能專主一端，而必須參照唐宋時代的韻文押韻及其他語言材料全面地加以考察。”^⑩就本文這裏討論的對象而言，熾俟就是一個古代西北族群名稱的譯音。伯希和早已敏銳地感覺到：“Çigil 或亦為葛邏祿三部落中熾俟部落之對音”，“此種考訂，在一定限度中系於‘俟’字之讀法”^⑪。但是，“俟”字並非常用字，其讀音古今變化又比較大，因此要擬測熾俟的古讀音值比韻文更難。我認為，音韻學界研究上古聲母的經驗^⑫值得借鑒，為了得出正確的結論，除了前人成果之外，我們有理由充分利用異文、諧聲偏旁、聲訓、讀若(即古讀)和異切(又

音)等方面的證據。這裡先看一下異文材料:

《隋書》卷八四《北狄鐵勒傳》:“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謹、紇骨、也咥、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

《資治通鑑》卷一七九引《隋書》同。

《北史》卷九九《鐵勒傳》同《隋書》,唯烏謹作“烏護”,於尼謹作“於尼護”。

中華書局標點本《隋書》、《北史》中的這一段讀為:“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②,將“職乙”二字讀開,恐怕有誤。實際上,這裡提到的薄落和職乙就是唐代葛邏祿三部聯盟中的兩個重要成員^③。《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附《葛邏祿傳》:“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婆旬;三踏實力。”^④內田吟風認為:“中國人在隋代就已經知道構成葛邏祿三姓中的 Bulāq 族(葛邏祿之一姓,《唐書》寫作謀落)與 Ćigil(葛邏祿之一姓,《唐書》寫作熾俟)遊牧於哈密以西、焉耆以北的天山北麓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薄落、職乙是 Bulāq、Ćigil 的漢字音譯名。”^⑤考慮到標點本《隋書》及《北史》將“職乙”二字讀開並沒有提供特別的理由,我們可以同意內田的意見。

二、“職乙/熾俟”古音比對 Chigil

通過繆勒和內田吟風的工作,我們可以得到熾俟 = Chigil = 職乙這樣一個公式,運用排中律,不難判定職乙是熾俟的異文。但是,如現狀所見,缺乏有力的音韻學論證,學界不肯輕易接受上述公式。其實,通過史料排比我們也可以肯定職乙是熾俟的異文,而作為異文,“職乙”有助於我們對“熾俟”的中古讀音進行正確的擬測。王力先生說:“《廣韻》的紐,須從其反切上字去尋求”^⑥;同理,中古音的韻母,也必須從《廣韻》的反切下字去尋求^⑦。遵依此法,我們可以將“職”的隋唐音擬測為 *tɕiək^⑧,這是一個正齒音(照系)開口三等職韻的入聲字^⑨;同樣,“乙”的隋唐音可擬測為 *Oit^⑩,這是一個喉音(影母)開口三等質韻的入聲字^⑪。

職乙/熾俟在隋唐時代讀作 *tɕiək Oit,這個讀音並不能與 Chigil 完全對

應，這方面的困難非自今始。司馬溫公著《資治通鑑》時就曾慨歎：“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之，故訛謬不一。”^⑧不過，就我們的研究物件而言，還可以再做一些工作：

第一，Chigil 是一個雙音節詞，要用漢語的單音節字來譯寫，就有一個連讀變音的問題。我們同樣注意到，漢語“入聲字的尾音-p、-t、-k 都是一種唯閉音（implosives / невзрывные）”^⑨，也就是說，“其收音的 p、t、k 只有成阻、持阻而沒有除阻”^⑩；職收 k，乙的聲母是○，二者發音部位相近，發音方法相同，有可能順同化^⑪；況且，據王力先生意見：影母“這種喉塞音是可有可無的”^⑫。所以，-k 與○連讀而除阻，並為一個音素也是可能的。誠如是，職乙作為譯音詞，它的實際音值應該是 *tɕʰəkɪt，用拉丁字母轉寫就是 Chigit/Ĉigit^⑬。

第二，據韓儒林先生的研究：《廣韻》“入聲字中‘質’、‘術’等十三韻的字，收聲為 t，唐代民族語中音節有 d、t、r、l 收聲時，用漢字音譯時，均選用這十三韻中聲音相近的字，如用設譯 shad（官名），汨譯 qut（幸福），密譯 mir（星期日），闕特勤譯 Kül Tigin（人）”^⑭。可見，隋唐時代的職乙 Chigit 可說是 Chigil 的標準譯音。

三、俟字的讀音問題

我們注意到，熾字在《廣韻》聲母系統中屬昌母（穿三），音值為 tɕʰ，章（照三）、昌同屬照系，又都是三等，發音部位相同（正齒音），僅有送氣與否的差別；職字作為熾字的異文，說明它們的聲母可以相通。同時，從漢語音韻學的角度來說，“乙”為“俟”的異文，就說明二者可以對轉^⑮，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讀。這個結論也得到諧聲偏旁等材料的支持，沒有這些材料，單憑異文的《廣韻》反切，就有可能流於簡單化。直接以熾俟對譯 Chigil，關鍵是“俟”字的讀音問題，就是說，必須搞清楚隋唐時代的“俟”字能否讀喉牙音（g）、開口三等（i）入聲。

“俟”字能否讀喉牙音，這個問題至少從《切韻》（成書于隋文帝仁壽二年，即公元 601 年^⑯）時代就已經存在了。邵榮芬先生曾經分析了《切韻》系韻書以外各家俟字的三類音切，指出：“第三類多把俟母字讀作喉牙音，這和諧聲的現象

大體一致。俟母的字不是從‘矣’得聲，就是從‘𠂔’得聲。‘矣’是匣三（喻三），‘𠂔’是曉母，都是喉音。這一派的人時代又都比較早，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俟母原來大概是喉牙音，後來才變為齒音二等的。俟母字很少，又祇出現於之韻系，大概就跟它的來源特殊有關，從呂（忱）、郭（璞）等人的讀音來看，俟母字由喉牙音變齒音二等在《切韻》以前並沒有在所有的方言都發生。”^⑧邵先生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們來看一下諧聲字的情況。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人部，“俟，大也，從人，矣聲。《詩》曰，𠂔𠂔俟俟。”^⑨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頤部第五哀集了幾乎所有矣旁諧聲字：挨、埃、浹、俟、埃、唉、欸等都是從矣得聲^⑩。王力先生在《漢語音韻》151 頁以下列了一個諧聲表，其中(1)之部有𠂔聲，注曰：“𠂔即以字，亦即已字。似矣台等字從𠂔得聲。”顯然，“矣”屬上古之韻，讀喉牙音，其音值可擬測為 *ɣiə，這是一個匣母（喻三）開口三等的之部字。

有了諧聲偏旁這個有力的佐證，我們證明俟字能讀喉牙音開口三等這一步工作似乎可以結束了，但實際上問題並不這樣簡單。王力先生曾引用聲訓和《詩經》材料證明“俟”字在《詩經》時代已讀作 *ziə^⑪，不過，仍有證據表明“俟”字的喉牙音讀法保留了下來：

1. 《廣韻》中“俟”字又音祈，渠希切^⑫，《集韻》該字此音作渠之切^⑬。渠屬群母，牙音，據邵榮芬先生的研究（見前），“俟”字的喉牙音讀法是上古音。從音韻學常識也可知道，又音多半是古音的遺留。

2. 之（開三）屬上古之部，希（微韻開三）屬上古微部，二者在中古後期合流^⑭。《集韻》也屬於中古音的《切韻》系統^⑮，雖然成書比《廣韻》晚三十年，但保留了某些《廣韻》所沒有的古音^⑯。渠之切“俟”，上古音可擬作 *giə，這是一個群母開口三等的之部字，與“矣”字旁紐^⑰疊韻，這與諧聲偏旁佐證基本一致，就是說，俟從矣得聲是可信的。

3. 與王力先生所舉“俟”字 *ziə 音的例子全是動詞不同，遺留下來的“俟”字 *giə 音幾乎是專作人名和譯語用。如顧野王《玉篇》：俟，“又音祈，虜複姓万俟氏”^⑱。《鉅宋廣韻》上平聲卷第一，微韻第八，祈小韻：祈，“渠希切，十九。……俟，虜複姓，北齊有特進万俟普，万音墨”。同書上聲卷第三，止韻第六，俟小韻：俟，“又姓，《風俗通》云：有俟子，古賢人，著書。又虜複姓二氏，《後

《魏書》云：俟畿氏，後改為畿氏；俟奴氏，後改為俟氏。又虜三字姓三氏，俟力伐氏後改為鮑氏，俟伏斤氏後改為伏氏，《周書》：太祖賜韓褒在俟呂陵氏。牀床史切^⑧，又音祈，七”。宋董冲《唐書釋音》^⑨卷第二十二（唐書卷二一五上）“俟，渠之切”，同卷（唐書卷二一五下）“俟斤，上渠之切”；同書卷第二十三（唐書卷二二一上）“俟利，上渠之切”等等。《資治通鑑》民族譯名中的“俟”字，如“俟斤”、“屈利俟毗”、“俟利”等均作渠之翻或渠之切^⑩。

矣是虛詞、俟^{ˈgiə}是失去詞義的表音字，俟^{ˈziə}是動詞，這種現象說明最初的分化可能是由區別字義開始的。俟字由喉牙音變齒音二等不僅“在《切韻》以前並沒有在所有的方言都發生”（邵榮芬語），而且在《切韻》以後也並沒有在所有的方言都發生^⑪。俟字之所以在《集韻》裡以渠之切的形式保留了古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並不是作為常用字，而祇是作為專名和譯語用的表音字保留下來的。

最後，我們討論一下熾俟的“俟”字能否讀入聲韻尾的問題，這個問題並非如伯希和們所想象的那樣困難、複雜^⑫。

如王力先生所說：“中古漢語聲調的實際調值不可詳考。平、上、去、入這四個聲調的名稱可能是有意義的。‘平聲’可能指的是一種平調（大約是高平調）；‘上聲’是一種升調；‘去聲’是一種降調；‘入聲’是一種促調（作者自注：嚴格地說，促是音質問題，不是音高問題，不應該以為聲調的一種。但是傳統上總是把人聲作為聲調之一種。這裡依照傳統的說法）。”^⑬所以，俟^{ˈgi}和乙^{ˈOit}的區別主要是陰聲韻和入聲韻的區別。中國傳統音韻學對待陰聲和入聲的關係分為兩派：考古派把人聲歸入陰聲，審音派則將入聲獨立^⑭。王力先生最初傾向於考古派，後來他認為，如果入聲不獨立，那麼在擬測上古音值的時候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陰、入全念開音節，那就無法解釋入聲韻尾的產生；另一條是陰、入兩聲念閉音節，世界上又決無這樣的語言例證，因此，王力先生後來轉向了審音派的立場^⑮。王力先生的主張是：肯定陰、陽、入三聲是分立的，同時承認元音相同的三聲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音轉，區別一般和特殊^⑯。王力先生說：“甚至入聲也可以跟陰聲押韻，祇要元音相同，多了一個唯閉音收尾還是勉強相押，這叫做‘不完全韻’。”^⑰我完全贊同王力先生的主張，在漢語語音史上，有許多例子“都可以證

明人聲和陰聲不能劃若鴻溝”^⑧。

音轉的基本原則是元音相同或相近，這在語音學上是有根據的。高本漢說：“像廣州話那樣的唯閉音-k，在句末或在有停頓跟着的時候，實際上是不大聽得見的。像 mo_k 一類的字在一個停頓的前面，這個-k 從語音學上去分析，祇是前面的元音的一種滑收音 (off-glide)，它使你聽見舌頭放在-k 的部位；它的閉塞是悄悄地構成的，並沒有可以感到的破裂作用。除非沒有停頓，mo_k 被另一元音直接跟隨着，這個韻尾-k 才是顯然可以聽得見的（如我們前述“職乙”二字的連讀變音——引者）。現在，《詩經》裡入韻的字差不多全是在一行的末尾出現的，‘路’ *glo_k 等字經常被一個停頓跟着，這個唯閉音-k 就是不大聽得見的。因此，‘路’ *glok 和故 *kuo 押韻而不和‘毒’ d‘uok 押韻，那是很自然的。這種押韻，在聽覺上是夠諧和的。”^⑨高本漢對上古韻母（包括韻頭、主要元音和韻尾）的擬測問題很多，我們這裡可庸置毋論，王力先生就上述引文指出：“高本漢承認帶有唯閉音韻尾的字可以跟開口音節押韻，這一點很重要。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入聲韻尾-k, -t, -p 都是唯閉音，跟現代廣州話的入聲韻尾-k, -t, -p 一樣。”^⑩“漢語韻尾-p, -t, -k 是唯閉音，不但現代閩粵等方言如此，中古和上古也莫不如此。”^⑪“漢語入聲字的塞音韻尾都是一種唯閉音（祇有成阻，沒有除阻），叫做‘不爆破’，唯閉音要聽出清濁兩種塞音來是困難的，它不像英語的塞音收尾一般是爆破音，清濁可以分辨出來。”^⑫“唯閉音的性質是祇有成阻、持阻而沒有除阻（除阻時不成音）。這種唯閉音正如高本漢自己所說的，它‘祇是前面的元音的一種滑收音 (off-glide) ……’。”^⑬我們一再引用這些內容有些重複的論述，目的是想讓不諳音韻學的史學界同行對漢語入聲的性質有所瞭解，能夠從入聲是“前面的元音的一種滑收音”這一點上去認識元音相同的陰、入對轉這種現象。

上古“同類的韻部由於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通轉”^⑭，這一原則也適用於中古。王力先生指出：“《廣韻》206 韻，不但陽聲和入聲相配是整齊的，連陰聲和入聲相配也是相當整齊的。江有誥作《入聲表》，充分說明了陰、入相配的道理。江有誥在給段玉裁的信裡說：‘以等韻言之，質、櫛者，脂開口之人也；術者，脂合口之人也……’他的話是非常正確的。”^⑮在王力先生所擬測的 7 世紀（隋代及唐初）漢語標準音實際音位中有 i 韻（支脂之同用），相應的入聲韻是 it 韻（質術櫛

者同用)^⑩。如前所述,俟 gi 屬之韻開三,乙 *Oit 屬質韻開三,二者陰入相配。由此可見,中古俟、乙二字鄰紐對轉^⑪,作為異文互讀是不成問題的。總是因為“俟”字多用作譯語及專名,才有後人的改字。於是,我們可以把中古的“熾俟”直接擬測為 *tɕʰigi(t)^⑫,用拉丁字轉寫就是 Chigit,這與我們從異文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

四、處月不能對 Chigil

處、月兩字見於唐詩,羅常培先生的擬音作 *tɕʰiwo ŋiwet^⑬;據王力先生的擬測體系,處月二字的中古音可擬為 *tɕʰiu ŋiuet^⑭。無論哪一種擬音,處月兩字都是合口三等,這一點很重要!不僅如此,處屬中古御韻,魚語御在中古只有合口呼^⑮。王力先生說過:“一般說來,語音的變化都是有條件的變化;分化有分化的條件。上古韻部到中古的分化,大致有兩種條件:第一是等呼關係,即受韻頭的影響;第二是聲母的關係,即受輔音的影響。”^⑯顯然,在古代漢語語音變化中,聲母、主要元音和等呼都比韻尾重要。我們將會看到,由於漢語入聲韻尾的特點和限制,古人不僅用入聲字,而且也用後加字的辦法來對譯其他族群語言中的閉音節。因此,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做審音勘同工作,輕視主要元音和等呼而刻意強調韻尾是沒有道理的。

“所謂開口呼,指不圓唇的韻母;所謂合口呼,指圓唇的韻母,即韻頭帶 u 或 w 的,或主要元音是 u 的。”^⑰我們看到,Chigil 的兩個元音都是不圓唇元音;相反,處月二字均是合口呼,處字的主要元音是圓唇音 u,月字的元音帶圓唇韻頭 u,顯然不能對譯 Chigil。非但如此,從 Chigil 的元音來看,中古漢語裡祇有質韻開三能與其後一音節相對,語言實踐中用韻再寬,也只有主要元音為 i 的止、臻、梗三攝開口三等能夠通轉。月韻歸山攝,無論如何是同 Chigil 勘對不上的^⑱。還有,處是陰聲韻,月字疑母[ŋ],這個鼻輔音在連讀中可以作為前一音節的韻尾繼續保留(在漢語語音史上是趨於消失),但月字原來的合口三等介音 i 必須高化為輔音。月字讀音的這種變化是在近古的元代開始的,那時它的鼻輔音[ŋ]消失了,介音 i 高化為輔音[j],韻母則變成了[yæ], (注意!)同時入聲韻尾失落

了^⑧。我們不知道，在處月作為一個族群存在的那個時期（中古前期）能否有類似這樣的語音變化。退一步講，即使連讀變音，中古時期的處月 *tɕ'iu ŋiuet 二字也只能轉寫為 Chu(ŋ)yuät/Ĉu(ŋ)yuät；再退一步講，疑、群旁紐可替，處月讀作 *tɕ'iu giuet，那也只能轉寫為 Chugtiēt/Ĉugtiēt，這樣兩個字從漢語音韻學的角度是無論如何不能勘同為 Chigil 的。

伯希和在其《中亞史地叢考》之五《漢文突厥文譯寫之一特點》後有一篇“附說”，題目是《魏唐譯語中俟字之音讀》^⑨，這個題目本身就成問題。北魏、唐代，涉及漢語語音史的上古和中古兩個時期，許多韻部的音值都發生了變化，同一個字很可能表達的並不是同一個音。就以“俟”字為例，渠之切，止開三平之群，在魏晉南北朝讀 *giə^⑩，可以用來譯 gi 或 gie 音；在隋唐時代讀 *gi，可以用來譯 gi 或 gil。我們不能因為同是一個“俟”字就認為對譯的是同一個音^⑪，那就忽視了漢語從上古到中古的語音變化。就譬如這個“俟”字到現代就讀作 qi[tɕ'i]，我們不能認為它在隋唐時代就讀[tɕ'i]，與熾、蚩、嗤、媼同音。漢語音韻的演進結果必須維護，單憑《廣韻》反切，沒有韻文、方言、他族語文等材料證明，我們不能把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俟”字的譯音聯繫起來給以同樣的認識。

伯希和在他的文章中對繆勒將“俟”字韻尾讀成 il 或 ir^⑫提出懷疑，認為“以葛邏祿熾俟部落為 Ĉigil 似乎甚難”。誠然，伯氏提出疑問意在引起討論，但所疑者莫非拗於韻尾而已。我們同意繆勒的意見，俟斤又作乙斤 irkin 可以為證，俟利發即頡利發也是可以肯定的。古人譯他族語中的閉音節本來就不止入聲字一種形式，由於漢語的入聲收尾音僅 -k、-t、-p 三種，不能與他族語音完全貼切，因而也常常另外加字以其聲紐來表示他族語閉音節的尾音，這種加字的韻母多半與聲母帶音相同或相近，如利、力的至、職韻。這一現象值得專門研討，以彌補西北史地研究中審音與勘同工作的不足。總之，誠如伯希和所說：“韻字在若干可汗名號中為 el 之對音，固無疑義；而常用頡利二字全寫其音，亦無可疑。”頡字屑韻，本來就是入聲，之所以又用頡利譯其全音，其理由很可能是入聲韻尾唯閉音難以聽辨，有必要另加表音字予以強調。顯然，用頡利譯 el 並不能否定頡字的入聲，同理，用俟利譯閉音節也不表明俟字所譯他族語原文為非閉音節。應該

說，頡利發作為俟利發的異文，正是俟字在譯語中讀入聲的證據。伯希和還提出“省略中間流音譯法”，如毗伽(bji-gia)與苾伽(biēt-gia)互譯 bilgä 之例^⑧，來說明俟字沒有入聲讀法。其實這種類比法是很不科學的。科學的方法是實事求是，誠如我們在前面所引高本漢關於漢語入聲(滑收音/唯閉音/流音)的論述中所見，流音在詞中連讀時是不容易被省略的，相反，詞尾流音由於除阻不成音倒容易被省略掉，例如《隋書》中的“咥蘇”，很可能就是《新唐書》中“踏實力”的省略詞尾流音譯法。伯希和舉的例子，與其說是省略詞中流音，不如說是漢語音轉，因為我們知道，bilgä 在漢文史料中譯成“毗伽”的例子要比“苾伽”多得多，後來入聲趨於消失，就更多地用“毗伽伽”、“畢勒哥”一類來譯了。伯氏泥于所謂“俟字從無收聲聲母”的成見，反倒使許多問題變得不可理解了。

伯希和之所以提出以處月比對 Chigil，根據是突厥文《闕特勤碑》中的 Likän 被比定為人名“呂向”，他說：“漢字之‘處’字，在若干突厥語譯名中用之，據余所知，無一字能確實求其對音者也。然余在《通報》(1923 年 347 頁)中，曾以為在喀什噶里書中之 Čomül(讀若 Čömül, Čümül, Čömil)獲見處蜜部落之原名，‘呂’字古韻母與‘處’字古韻母絕對相同，則其解決之法皆同矣。按突厥語譯漢語之古-ıwo 韻母，有時作-i，有時作-ö(-ü)，有一中國古韻母-ıwo 在突厥語作-i 之例，似在突厥處月部落一名中見之。此名似可考訂為 Čigil，然此 Čigil 或亦為葛邏祿三部落中熾俟部落之對音，故將此處月問題暫時不言[原注：此種考訂，在一定程度種系於‘俟’字之讀法，余將於附說中討論之(見本文前述——引者)]。”^⑨伯希和所迷惑的，恰恰是漢語語音變化的兩個最重要的條件：等呼和聲母。突厥語譯古漢語魚韻(-ıwo /-ıu)字之所以能有時作-i，有時作-ö(-ü)，一方面因為魚韻只有合口三等^⑩，前元音是其特證；另一方面，則與具體用字的聲母不同有關，光講韻母是不能說明問題的，我們不同意伯希和“古韻母絕對相同，則其解決之法皆同”的說法。即以伯氏所舉“呂”、“處”二字的語音變化為例：誠如伯氏所言，其“古韻母絕對相同”，但其聲母一為來母，一為昌母，這一區別非常重要，由此其解決之法就完全不同了！王力先生指出：“魚虞兩韻的字按聲母的不同條件而發展為 u、y 兩類：知照系和輕唇字(魚韻無輕唇)念 u，其餘念 y，只有‘所’、

‘廬’二字是例外(‘所’屬山母而念 suo,‘廬’本來和‘驢’同音,現代不念 ly 而念 lu)。”^⑧伯希和所舉的兩個例子並不屬於例外,處字昌母為照三,呂字來母非知照系,王力先生在現代韻母 u 的來源中舉例就有 $u \leftarrow \text{yo}^{\text{⑨}}$ (知照系)[魚]處;在韻母 y 的來源中舉例也有 $y \leftarrow \text{yo}$ (非知照系)[魚]呂^⑩。處、呂二字在漢語史上的語音變化,當然也可以說明它們在譯語中的音變不可能不受聲母影響,不可能與聲母無關,魚韻知照系的“處”字只能讀圓唇音。呂字在現代成都方言中就讀作 [li],但處字卻決不讀作 [tɕʰi]。呂字非知照系,因此,突厥文《闕特勒碑》中將“呂”字音譯作 Li 不能作為“處”字能讀 Chi 的根據。伯希和之失,是為重韻尾輕韻頭及聲母所誤,後學之人,可不慎與!順便還可以指出,伯希和說漢藏對音中魚韻“一概譯寫作-i”也是片面武斷的,同樣的材料還說明魚韻在藏語中也譯作 u,而且在《唐蕃會盟碑》中僅作 u 和 o(譯“主”字)^⑪。我們注意到,《唐蕃會盟碑》是以 o 譯“主”字的,“主”字章母(照三),這說明在唐代中期族際譯語中仍是以圓唇音來譯漢語中的魚韻知照系字的,這條材料要比伯希和那種簡單的語詞類比可靠得多。

伯希和之後,就 Chigil 的勘同問題提出異議的主要有法籍美國學者哈密屯,他基本肯定了伯希和提出的 Chigil 可能是處月的假設,同時有意將其與宋初王延德《高昌行紀》中提到的大小衆熨及和闐語文獻中的 cūṇūḍa 勘同,他說:“因為在十世紀的漢文中,喉鼻音 ŋ 和聲門爆發音‘·’一般都是用來表示突厥語中的‘g’與‘γ’。因此,這裡的對音字‘大衆熨’*tsung- ū’就可能是 Čügül。然而,有關元音的作用尚待解釋(為什麼使用了元音‘ū’而不是‘i’)。”^⑫這段話裡有兩點需要解釋一下:

第一,哈密屯用的是普通語音學概念,所謂“聲門爆發音‘·’”就是指漢語音韻學中的喉音影母[○],伯希和稱之為“強喉音”。所謂“用‘·’來表示突厥語中的 g 與 γ”意思就像用乙 *○it 譯 gil 那樣(但和我們所講-k、○同化為 g 不同)。

第二,*tsung- ū’是哈密屯對“衆熨”的擬音,但經我們檢查,發現它的實際讀音是仲蔚。熨,《集韻》煇,紆問切,文韻合三[iuən]去聲,這是一個陽聲韻字,即使在唐五代西北方音裡也無-r 尾。